

中国劳动力短缺 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吗

——基于产业后备军理论的存量和流量分析

□谢富胜 □匡晓璐

随着民工荒、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东南飞”现象的出现,学术界为中国劳动力是否短缺争论不休。刘易斯拐点论和人口红利论看似为解释该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其结论随经验估算方法和对理论解读的不同而相去甚远。本文以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为基础,将宏观统计数据 and 微观数据库结合起来,估算了1991—2015年中国产业后备军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尽管中国产业后备军的数量在减少,但其数量仍多达2亿人左右,而且其下降趋势存在逆转的可能,现在谈中国劳动力短缺为时尚早。

关键词: 产业后备军; 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短缺

中图分类号: F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18)01—0012—08

DOI:10.16158/j.cnki.51-1312/f.2018.01.00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吸纳了大批城镇工人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上世纪末基本形成了劳动力市场。据统计,1995年中国工资劳动者约有30677万人,^①2015年已达到55532万人。^②数以亿万计的劳动力,尤其是廉价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是维持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以及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1]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警报拉响:“民工荒”现象出现并迅速蔓延、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逐年萎缩,且呈现老龄化趋势。随之而来的是逐年增长的劳动者工资与部分外包制造业“东南飞”,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劳动力短缺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吗?

目前国内外研究中,针对中国劳动力是否短缺问题的分析主要有“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两大理论。以蔡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剩余劳动力规模逐渐萎缩,劳动者工资普遍上涨且熟练与非熟练劳动者、农民工与城镇工人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间工资趋同,判定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呼吁政府应当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延迟退休年龄。^{[2][3]}另一些持乐观态度的学者预测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将持续到2030年^[4],虽然劳动者名义工资随经济增长而有所上涨,但是城乡部门实际收入差距仍未消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规模仍然庞大,劳动力供给仍有相当大空间。^[5]还有一些学者指出人口红利理论背离中国现实,若政府转向增加人口的政策,人口规模的滞后效应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6]刘易斯拐点理论也备受争议。主流学者在舒尔茨的分析框架下否认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认为农村家庭的理性选择使得劳动力市场自动出清。^[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则批判刘易斯理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平均利润趋于下降规律与经济危机研究”(14AJL003)

作者简介: 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匡晓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数据来自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http://www.mohrss.gov.cn/>)。

^②由总就业人口扣除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数量得出,数据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论缺乏制度基础,不适用于解释中国情况。^[8] 本文认为这两种流行的理论在对中 国劳动力市场进行技术性的经验分析时都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中国现实情况,导致估算结果的不准确。人口红利理论完全忽视了伴随经济发展过程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而流行的刘易斯拐点理论虽然注意到了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但没有将其从农业部门扩展至非农部门,也没有区分剩余劳动人口和劳动力供给的区别。^①

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情况有一个清晰准确的认识是政府能够做出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决策的前提。尽管“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这两大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利用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估算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相对过剩人口,判断中国劳动力是否会趋于短缺更为适宜。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借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市场经济的理论。^[9] 已有的结合产业后备军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研究主要是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尚未有对中国的产业后备军的数量规模和变化进行经验估算。^[10] 本文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产业后备军的经验估算的基础上,将中国的宏观统计数据与微观数据库结合起来,估算了 1991—2015 年中国产业后备军的存量和流量,来考察中国劳动力供给情况及相应的问题。

一、产业后备军:从理论到经验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表明,随着资本积累扩大,可变资本相对比重缩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生了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从而阻碍了实际工资的持续上涨。产业后备军可分为流动的、潜在的和停滞的三种。流动的产业后备军由被机器替换的失业工人组成;潜在产业后备军主要来自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排斥的劳动者,如自耕农、独立的手工业者等;停滞的产业后备军类似“非正规就业者”^②,是那些没有劳动保障和福利、报酬低微的就业人口。^{[11]725-742}

斯威齐将产业后备军理论的产生过程进行了形象化的图解,如图 1 所示。他指出,劳动力市场中有六种源源不断的流动人群,第一种和第二种分别是刚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新工人和找不到工作只能加入后备军队伍的新工人;第三种是被机器替换而进入后备军的工人;第四种是随着产业发展而被吸纳到后备军队伍中的工人;第五种是在失业一个时期以后就放弃找工作而加入退休工人队伍的人;第六种是结束劳动生涯的退休工人。该图清楚地阐明了产业后备军不断形成、被吸收和再形成的过程。^{[12]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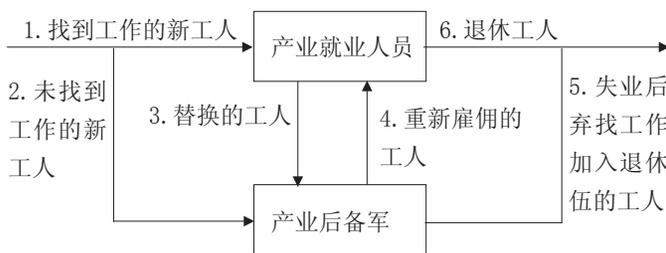


图1 产业后备军理论图示

资料来源:改自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9页。

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对产业后备军进行过经验估算。马克思发现英格兰官方公布的贫民数在 1855 年至 1864 年间增长了 14.1%^{[11]753},占全部人口的 4.6%左右^{[13]357}。布雷弗曼在研究美国战后繁荣时期的就业情况时发现,随着工业机械化和自动化,低工资率的新兴职业兴起,传统工业部门劳动力需求萎缩,男性被机器替换而失业,女性则被新兴职业雇佣而扩充产业后备军的停滞部分,官方登记的需要福利补助的人员数量达到全部人口的 7%。^{[13]356-357}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重组^[14],福斯特指出全球劳动力增长、南北工作转移以及国际低工资竞争加剧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全球产业后备军的生长。他使用国际劳工组织汇编的全球劳动力数据,将失业者、脆弱的雇工、处于主要劳动年龄段(25—54岁)的非经济活动人口相加,得出了 2011 年全球产业后备军的数量大约是 24 亿人,而就业人口是 14 亿人。^[15]

①必须指出,刘易斯本人分析的不仅仅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只是该理论中国化后被学者们遗忘了。

②非正规就业、非正规经济见于黄宗智的研究。

巴苏在斯威齐的基础上,利用美国劳工统计局组织的当期人口调查(CPS)数据^①,估算了美国战后经济中的产业后备军的存量和流量。巴苏结合马克思对产业后备军的分类和CPS中的指标“非机构的人口(CIV)”^②以及美国司法统计局公布的当期监狱服刑人员数据,首先估算了四种不同口径的产业后备军存量——失业人员,失业人员和就业人员中的兼职者,失业人员、兼职者与非劳动人口中的准待业工人^③,失业人员、兼职者、准待业工人和监狱服刑人员。其次,巴苏利用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月度数据,将人口中就业人员与失业人员加上非劳动力人口之间的流动估算了产业后备军的流量。他的估算表明美国的产业后备军存量从20世纪50年代的500—600万人飙升至2011年的2500—3000万人,且在结构性危机期间增长得最为明显。美国产业后备军的两条流量曲线相互交织,其绝对规模在1990年至2010年持续增加了将近1000万人,占劳动人口比例则均表现为波动下降。^[16]

二、中国产业后备军存量与流量:估算方法

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和统计数据的缺失意味着估算中国产业后备军的存量和流量面临着诸多困难。我们先将中国的劳动力按各自社会身份分类,然后将微观数据库与宏观统计数据结合起来进行估算。

(一)存量的估算方法

不同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除了城镇工人外,中国拥有大量相对土地过剩的农村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了生计需要放弃务农而流入城市,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形成了特殊的农民工^④群体。这样,中国的劳动力可分为城镇劳动者^⑤、农民工和农村劳动者^⑥。城镇劳动者中的失业者、家务劳动者及非正规就业者应当属于产业后备军,称之为城镇产业后备军。尽管农民工属于非正规就业者,但在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工随时可以回乡务农,而失业农民工——失业后仍在城市寻找工作的人才属于产业后备军。农村劳动者中的产业后备军,由无业的农村劳动力和农业生产潜在剩余劳动人口组成,称为农村产业后备军。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仍以家庭农场为主,资本主义农场占比极低^[17],我们不能将务农者纳入农村产业后备军进行估算。

1. 城镇产业后备军

中国国家统计局仅公布了城镇登记失业人口——身在城镇并拥有城镇户口、主动去当地就业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失业者人数,并没有正式统计非正规就业和家务劳动者数量,不能直接为我们所用。近年来,中国各大研究机构、科研院所和高校积累了一批微观数据库,涉及个人就业信息的详细调查,我们可利用这些数据库,估算出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占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⑦,然后按公式(1)估算城镇产业后备军总体存量:

$$\text{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 = \text{城镇户籍劳动年龄人口} \times \frac{\text{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_{\text{微观数据库}}}{\text{城镇户籍劳动年龄人口}_{\text{微观数据库}}} \quad (1)$$

其中,城镇户籍劳动年龄人口由《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公布的城镇常住人口中15—64岁人口的比例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⑧中的城镇户籍人口总数相乘得到;而微观数据库的城镇户籍劳动年龄人口则直接统计城镇调查点中城镇户籍样本的劳动年龄人数即可。估算微观数据库中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的主要任务即厘清样本是否属于失业者、非正规就业者和家务劳动者。样本

①CPS是始于1940年的月度调查数据,样本量为6万个美国家庭。

②CIV是指16岁以上的自由公民(非监狱服刑人员或精神病人、非军人),CPS将其分为就业人员、失业人员和非劳动人口。

③准待业工人是指在过去的12个月内找过工作,但在过去四周内没有找工作的人。

④本文主要讨论进城务工农民工,即狭义农民工。

⑤指拥有城镇户口并在非农部门就业或没有工作的劳动力。

⑥指常住地在农村,务农或从事非农工作以及没有工作的劳动者。

⑦指16—65周岁的人口。

⑧该报告仅公布了城镇户籍人口和城镇常住人口数(1978—2012)的折线统计图,前者具体数据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城镇常住人口数估计。另外,2013年城镇户籍人口数由城镇常住人口数增长率估算。

是否为家务劳动者在各个数据库中都有明确说明,可直接统计,我们只需要根据各数据库不同的问卷设置找出失业者与非正规就业者即可。

本文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HS)、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等四个微观数据库进行估算。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负责的UHS为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的估算提供了1992—2009年的连续数据,调查范围为中国的6—10个省或直辖市,样本容量为4000—30000户家庭。UHS将样本的就业状况分为15类,其中“待业人员”与“待分配者”之和为失业人口,“其他就业者”——没有固定性职业,在所调查的月份内从事社会劳动时间超过半个月,所取得的报酬在当地足以维持本人生活的人员属于非正规就业者。UHS的优点是调查年份连续、各年统计指标相同,但它没有将正规就业部门的非正规就业者分离,估算结果偏低。

CHIPS、CGSS和CHNS的调查中都专门将临时工与正式就业工人分开统计,弥补了这个缺陷。CHIPS有1988年、1995年、1999年、2002年、2007年、2008年和2013年等年份数据,样本容量超过15000户家庭(1999年除外),覆盖中国多个省市。CHIPS(1988)因仅调查获得收入的家庭成员状况被剔除。失业人口即CHIPS(1995—2013)中就业状况为待业或失业的人^①;我们将临时工、家庭帮工计入非正规就业者。CGSS主要有2003年、2005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等年份数据,覆盖中国20多个省和自治区的5894—11438户家庭。CGSS(2003)与CGSS(2005)因没有统计失业者数量,我们只能剔除。CGSS(2006)的失业人员是无工作三个月以上的样本,非正规就业者即临时工;CGSS(2008—2013)仅仅调查样本当前是否有工作,我们将持续无工作六个月以上的样本算入失业人员,并将零工、散工、劳务派遣工^②纳入非正规就业者类别。CHNS主要有1989年、1991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和2011年等年份数据,调查了中国多个代表性省份的3000—6000户家庭。CHNS(1989)因没统计失业者数量被剔除。我们将调查期内“正在找工作”的人算入失业人员、工作性质为临时工的人统计为非正规就业。与UHS相比,CHIPS、CGSS和CHNS项目开展时间间隔不连续且有的间隔不一致,会忽略未调查年份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的关键性波动。这四个数据库各有其局限性,但它们可以互为补充和验证。

2. 失业农民工

失业农民工总量由微观数据库估算的农民工失业率乘以《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3—2006)》和《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08—2015)》公布的外出农民工总数得到。^③《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外出农民工是年龄大于16岁的农业户籍工人,约99.6%的外出农民工流向城镇,我们保留城镇调查点16岁以上非学生且有劳动能力的农业户口样本,估算各数据库失业者占总样本的比例即可得到农民工失业率。^④《中国统计年鉴》表明,外出农民工约占城镇常住人口的30%,UHS不符合这一标准而不能用来估算失业农民工。其次,2007年的外出农民工总量是前后两年的平均,2000—2001年数据我们按平均增长率估算得出。

3. 农村产业后备军

农村产业后备军按公式(2)来估算,无业农村劳动力近似为农村劳动力资源^⑤与乡村就业人员以及农村高中生之差。^⑥农村劳动力资源由《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平均每户整/半劳动力数占每户人口的比例^⑦与《中国统计年鉴》中农村常住人口数的乘积得到。估算农业生产的潜在剩余劳动人口的方法尚未有定论,我们将其定义为农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缺口,即农村农业就业人员和农业必须的劳动投入之差,前者直接来自于统计年鉴,后者利用《全国农产品收益和成本汇编》公布的各类农产品单位

①CHIPS(1999、2002)的就业状况新增了内退人员和提前退休两类,即未达到退休年龄而被企业排挤出的员工,我们统计为失业人员。

②劳务派遣工与企业只有劳务关系,企业可以“只用工而不用人”从而规避其对工人的法定义务,属于非正规就业的一种。

③外出农民工总量由国家统计局在农村调查点的间接调查而得,包括失业农民工,这是劳动力概念。

④各数据库失业和待业者的统计方法同城镇产业后备军。

⑤指16岁以上具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农村常住人口。

⑥农村经济活动人口和乡村就业人员都是常住地意义上的统计指标,不含外出农民工,不涉及重复计算。

⑦该比例几乎没有变化,2010年以后沿用2010年的数据。

用工量乘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农产品总产量,再除以标准年工作日即270天估算。^[18]

农村产业后备军=无业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的潜在剩余劳动人口=(农村劳动力资源-农村高中生数-乡村就业人员)+(农村农业就业人员-农业必需的劳动力投入) (2)

(二)流量的估算方法

产业后备军流量考虑的是产业后备军被现代产业吸纳和排斥的动态变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本年失业人员就业人数”的人数可视为产业后备军流向现役劳动军的流量,而现役劳动军流入产业后备军的流量则用新增失业人数表示。新增失业人数即当期失业人数减上一期失业人数加当期再就业人数。但“本年失业人员就业人数”仅仅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转就业的人数,这会低估产业后备军的流量。

三、中国产业后备军存量与流量:估算结果分析

(一)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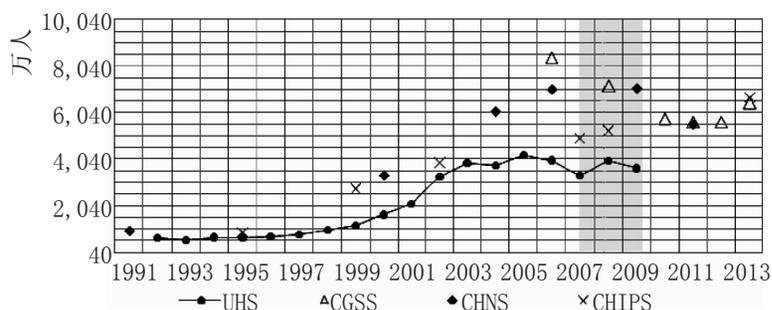


图2 1991—2013年中国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规模

表1 2000—2013年失业农民工规模及比例

年份	失业农民工规模 (万人)			农民工失业率		
	CHIPS	CGSS	CHNS	CHIPS	CGSS	CHNS
2000			425.8			4.5%
2001						
2002	281.6	/	/	2.7%	/	/
2003	/	/	/	/	/	/
2004	/	/	917.5	/	/	7.8%
2005	/	/		/	/	/
2006	/	989.6	601.1	/	7.5%	4.6%
2007	169.0	/	/	1.2%	/	/
2008	261.2	874.8	/	1.9%	6.2%	/
2009	/	/	813.8	/	/	5.6%
2010	/	482.1	/	/	3.1%	/
2011	/	454.0	894.7	/	2.9%	5.6%
2012	/	649.8	/	/	4.0%	/
2013	518.2	772.7	/	3.1%	4.7%	/

我们将四个微观数据库的估算结果绘制在图2中(阴影部分表示美国金融经济危机期间,下同),可以看出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的变化趋势,从1991年的900—1000万人上升至2013年的6000—7000万人,其占城镇户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从5.9%增加至17%。从整体上看,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在世纪之交——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且加入WTO——有显著增长,1999—2002年间增长率在40%和180%之间。受2008年美国金融经济危机影响,中国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有所增加,但很快便恢复过来并逐渐下降——2008—2011年间大约下降了22%左右。然而,根据CGSS的趋势线,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于2013年再次上升。人口因素对城镇产业后备军几乎没有影响,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占城镇户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变化情况也是类似的。

由于农民工就业短工化和弹性化,失业农民工的估算结果在三个微观数据库间差异比较大,如表1所示。从整体上看,2013年,农民工的失业率低于5%,数量在518万人至773万人之间徘徊。失业农民工数

和农民工失业率在三个微观数据库的各自统计区间内都呈现出U型变化趋势,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界,此前失业农民工数量和比例下降,此后上升。CGSS数据库的结果表明,2011—2013年失业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

图3(左)刻画了农村产业后备军存量波动下降的趋势——其规模和占农村户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下降了35.8%和18.3%。分阶段来看,2002年至2005年农村产业后备军存量下降了2000多万人;2005年以后逐渐回升,2008年稍有下降,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后迅速回弹,2008—2009年的增长率为8.5%。在2009年达到2亿人规模的峰值后,农村产业后备军存量开始下降。2015年,农村产业后备军存量还剩1.3亿人,占2009年农业产业后备军存量的67.7%。农村产业后备军存量占农村户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变动也是类似的。我们把农村产业后备军按其两个组成部分——无业农村劳动力和农业生产的潜在剩余人口分拆后(图3右),会发现2009年以前农村产业后备军变化的情况与无业农村劳动力相似,而此后则是农业生产的潜在剩余人口的下降主导了农村产业后备军的下降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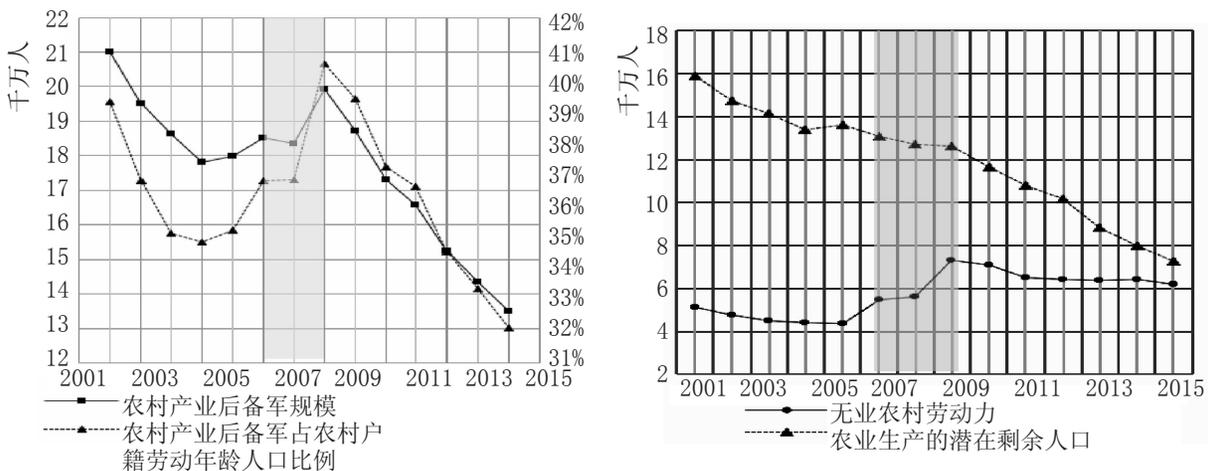


图3 2002—2015年中国农村产业后备军及其结构

最后,我们将三部分估算结果合并并在图4中,添加趋势线后发现2002—2013年间产业后备军存量规模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总规模依然庞大,在2013年约有2.24亿人,占劳动年龄人口的22.3%。占产业后备军总存量65%—80%的农业生产的潜在剩余人口主导了下降趋势,但非农部门的失业人口不断上升表明巨大的农村转移劳动力难以被消化吸收,迟早会导致产业后备军回升的反趋势。另外,产业后备军占总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变化与此是一致的,也说明这里并不存在人口因素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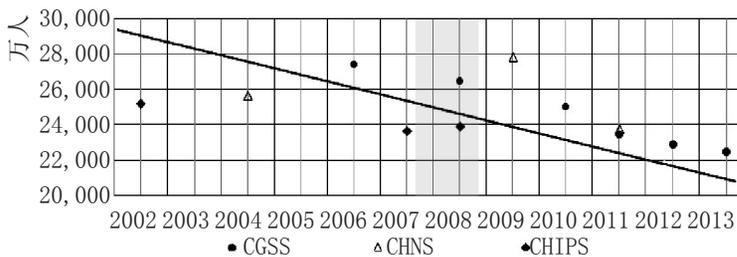


图4 2002—2013年中国产业后备军存量的规模

(二)流量

产业后备军流量规模和其占城镇户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变化如图5所示。1993—2015年间,两条流量曲线交织着呈S型变化,2000年以前,均在440万人的低位保持平稳,2001—2008年间产业后备军流向就业人员数增加了1.17倍,流向产业后备军的就业人员增加了0.97倍;此后,两条流量曲线在2009年开始下降,随后平缓波动、缓慢攀升、近似重合。产业后备军流向就业人员反映了经济增长过程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而就业人员流向产业后备军则反映了技

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我们可以发现,1993—2015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产业后备军队伍中吸纳了将近1000万人,尤其是2001—2008年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对产业后备军的吸纳能力提高了3倍,但这一切在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后开始放缓。就业人员流向产业后备军的数量增加了800万人左右,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不断产生被技术替代的产业后备军,一方面又顺应劳动力需求将其中一部分人拉回就业队伍中去。此外,大部分时间里就业人员流向产业后备军的曲线都在产业后备军流向就业人员曲线之上,与城镇产业后备军存量的上涨对应。与流量规模的变化不同的是,产业后备军流量占城镇户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呈N字型的变化,如果我们只看起止点,这一比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均维持在2.2%左右,但这两条流量曲线都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过程,表明产业后备军流量规模的变化受人口增长因素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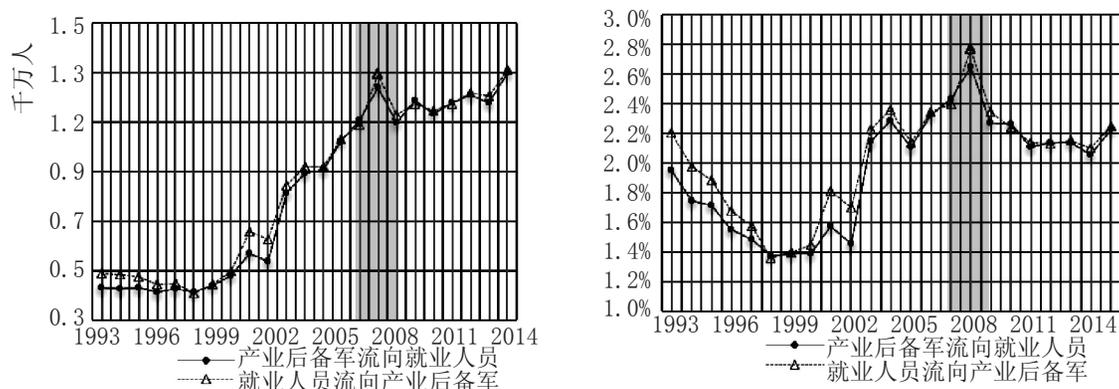


图5 产业后备军流量及其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四、结论：中国劳动力真的短缺吗

从我们对产业后备军的经验考察来看,产业后备军存量因农业生产的潜在剩余人口减少在2002—2013年间呈下降趋势。但2008年以后非农部门失业的增加表明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并不能完全被城市经济部门吸收,产业后备军总量迟早会再次上升。中国产业后备军蓄水池仍有2亿人的庞大规模,现在谈劳动力短缺还为时尚早。

现阶段产业后备军存量的减少虽然促进了中国劳动者工资的上升,但随之而来的是劳动时间的延长。在中国,各行各业均有超时劳动现象,无论是办公室白领、流水线上的工人还是工地里的农民工,都面临加班问题。据统计,2015年每周加班超过五小时的白领多达67%^①,其中,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加班现象最为严重,甚至形成了一种企业文化。高新科技企业富士康的装配车间里,曾出现工人因加班频繁而过劳死的案例,而权益易受侵害的农民工,在2015年的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5.2天,是中国法定标准的1.32倍。^②他们往往聚集在“收入水平较高”的“体力型”行业,如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这些行业的工资基本是按日估算,农民工为了多赚点生活费而“自愿”加班、提高劳动强度。这种不可持续的工作模式使农民工到了40岁左右就会因身体原因被企业抛弃。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科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企业一般更愿意招聘18—35岁的普工,实在招不到人的情况下,最多放宽标准到40岁。^③然而《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显示,4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经达到了44.8%。企业一方面把40

①数据来自于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年白领8小时生存质量调研报告》。

②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引自:“不怕吃苦却难找工作 ‘4050’ 农民工,真不易”(http://news.163.com/13/0712/09/93IRLU5B00014AED.html)。

岁以上的农民工拒之门外,一方面又抱怨着“民工荒”,只能进一步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解决,如此循环。

我国政府捕捉到了国内劳动力短缺的信号,从2011年开始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于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该政策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争论:支持二孩政策的学者认为放宽生育政策能够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减轻劳动力短缺与人口老龄化的压力、缓和社会矛盾等诸多益处;而反对的声音则担心生育政策放宽后人口骤增,带来资源环境的压力、就业压力等问题。无论如何,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在未来十几年将会发生改变,产业后备军下降的趋势也可能因人口增长的因素而被逆转。

参考文献:

- [1]潘毅等. 农民工: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J]. 开放时代, 2009, (6): 5-35.
- [2]蔡昉.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J]. 经济学动态, 2011, (6): 3-6.
- [3]蔡昉, 都阳. 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学动态, 2011, (9): 9-16.
- [4]郭晗, 任保平. 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 当代财经, 2014, (3): 5-13.
- [5]李刚. 工资上升、劳动力短缺与刘易斯拐点幻觉[J]. 人口与经济, 2012, (6): 39-45.
- [6]侯东民.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J]. 人口研究, 2011, 35, (3): 29-40.
- [7]SUQIN GE, DENNIS TAO YANG.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s in China: A Neoclassical View[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1, (4): 611-625.
- [8]蔡万煊. 论刘易斯拐点理论对中国经济的适用性[J]. 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 2012, (3): 54-62.
- [9]习近平. 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J]. 东南学术, 2001, (4): 26-38.
- [10]吴垠. 刘易斯拐点——基于马克思产业后备军模型的解析与现实意义[J]. 经济学动态, 2010, (10): 59-68.
- [11]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2]斯威齐. 资本主义发展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3]布雷弗曼. 劳动与垄断资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4]TERRENCE MCDONOUGH.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21-140.
- [15]FOSTER, JOHN BELLAMY, R. W. MCCHESENEY, and R. J. JONNA. The Global Reserve Army of Labor and the New Imperialism[J]. Monthly Review, 2011, (6): 1-31.
- [16]D. BASU. The Reserve Army of Labor in the Postwar U.S. Economy: Some Stock and Flow Estimates[J]. Science & Society, 2013, (2): 179-201.
- [17]黄宗智, 高原, 彭玉生. 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 中国的农业发展[J]. 开放时代, 2012, (3): 21-22.
- [18]郭金兴, 王庆芳. 2002—2010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结构的估算[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4, (4): 23-33.

(收稿日期: 2017—10—15 责任编辑: 肖磊)

Does the Era of Labor Shortage in China Really Come? --Stock and Flow Analysis Based on Industrial Reserve Army Theory Xie Fu-sheng, Kuang Xiao-lu

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southeast fly” in manufacturing, academics debate endlessly about whether China’s labor force is in short supply.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seem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xplaining the issue, however, its conclusions differ as a result of different empirical estimation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reserve army of labor, this paper combines macroeconomic data and micro-database to estimate the change of China’s reserve army of labor from 1991 to 2015.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lthough reserve army of labor in China is decreasing, its size is still about 200 million and its downward trend may be reversed. It is too early to assert that China has reached the era of labor shortage.

Key words: Reserve army of labor; Labor market; Labor shortage